

排外與中國政治

廖光生著



三民書局 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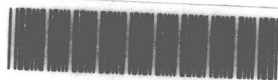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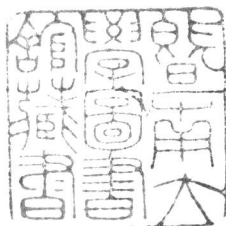
674015

D809
912.

排外與中國政治

Y

廖 光 生 著



90095086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本版屬台灣版，限在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發售。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謹以本書

紀念

先嚴，先慈

金 序

廖光生博士告訴我，他的《排外與中國政治》將發行臺灣版，囑我寫一序言。廖光生博士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多年同事，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學者。他的《排外與中國政治》自在香港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迴響。我能為這本大著向臺灣讀者界作一介紹是非常快意的事。

《排外與中國政治》是廖博士英文原著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860-1980* 的中譯本，其實，更確切的說，是他根據英文版改寫的，因為中文版不止是翻譯，還做了許多補充，並且增加了十二章「開放政策與排外」及後記。這本書之所以引起這許多迴響，不但是由於本書題材的吸引力，更由於這是第一本對中國近代排外現象作有系統的生動而深入的分析。

排外是人類歷史中一個普遍的現象，它與近代的民族主義幾乎可說是共生物。而過去一百多年中，排外現象更是與中國政治結下不解之緣。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排外與現代化運動的消長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作者在導言中說：「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又是一部中國人的禦外史，任何關於中國政治或對外政策的研究，都離不開對中國的排外情緒的探討。」誠然，作者把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對外的政策之研究，以排外作為一探討的焦點，確是極有心思與見地的策略。不錯，如作者所指出，排

外早有一般性的理論探討，國內政治與對外行爲的關係之研究也大不乏人，在西方文獻中，對這個課題甚至有跨文化與跨國的研究，更有甚者，即使特別就中國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之間的聯繫亦曾有人論及，但是，在廖光生博士之前，關於中國國內政治與對外行爲之間的聯繫，最多不過是一些初步的認識，而在本書中，中國的國內政治與對外行爲的具體關係，才在政治體制與環境因素的交互影響的分析中，得到集中性的系統處理。作者的業師，密西根大學教授艾倫·惠亭 (Allen S. Whiting) 認為，在過去一百二十年長時期中，中國排外現象的了解是學術研究中的一個巨大空白，而這個巨大空白則由此書填補了。這樣的稱譽是不算誇大的。廖光生博士本書對於中國近代的排外行爲的分析不但使我們對中國排外行爲（指一種集體性的對外國的敵對性反應）有了深一層的認識，也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性將更多了一個理解的新角度。

本書之研究主題是排外，作者開宗明義即說明排外與懼外 (Xenophobia) 不同。排外是「對外國的排斥反應」，懼外則「僅是對外國人的畏懼」。「排外是人民中間對外國的一種集體性情緒，在外來壓迫和入侵同排外情緒之間，存在着明確的聯繫。」（頁10）。全書除第一章論「排外的概念及理論」及第十三章為「結論」外，作者對於中國的排外的研究分為四卷。

卷一論「早期現代化之失敗及排外之興起」。作者提出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受西方勢力之侵逼，一敗再敗，排外心理之產生毋寧是自然的。但大規模之排外則到十九世紀後期才開始顯現，這是人民眼見政府之無能，不足禦外自保，便自己起來反抗在華的外國人，而傳教士也自然成為最易受攻擊的目標。作者說：「反教並不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排外運動的重心，外來入侵才是民眾仇外的根源。」「排

外與其說是文化和社會運動，不如說是一場源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頁59）在此時期，慈禧之利用義和團排外，是在以「夷」制「夷」政策之後利用的以「民」制「夷」的手法，其結果如作者所說是「一場愚蠢的賭博」（頁58）。在這裏，廖博士強調地指出，「中國的排外多半是一種對外來威脅的政治反應，而非中國政治文化所固有的。」他說：「以往有人誤解排外為中國政治文化之一重要組成部份。其實，中國人在感情上對外國的敵視是在列強不斷侵略中國之後才形成的。」（頁288-289）

卷二「為國家的獨立平等而反帝」。這是論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五年這段時期中的排外，作者認為二十世紀這段時期的排外與十九世紀末期的排外在本質上有別。前者與民族主義相輔相成，而後者則受種族、文化衝突所激發。前者在尋求民族利益，是爭取民族獨立平等的一部份，而後者則主要以驅逐外人為鬭爭方向（頁 90-91）在這個時期中，排外已取得理論的基礎，此即國民黨之反帝國主義政策，先反西方帝國主義，後反日本帝國主義。作者認為國民黨領導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反帝運動，反帝成為國民黨綱中外交政策的目標。他指出國民黨的領導人蔣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完成了孫中山奮鬥的生平願望，即廢除了不平等條約；租界、治外法權和固定關稅等（頁 118）。廖博士對於排外現象之分析是很冷靜的，他了解排外兼具建設性與破壞性，整個說來，他毋寧認為情緒性的排外是不可取的，特別是他認定排外是有害於現代化的（頁 294），也對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極左派的極端性的排外，尤予以嚴厲的批判，但他也肯定「排外是一種謀求國家利益的積極手段，是一個擺脫外國干涉中國之積極運動。」（頁11）

卷三「化『反帝』為政治力量」。本卷作者討論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〇年這段時期中中共的排外特質。這是本書所花篇幅最多的，

也是作者費力最大的，在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上也最具經驗性格。在本卷中，排外與中國內部政治的關係得到了詳盡的討論。一九四九年後反帝理論成為中共意識型態的重要部份。這種意識又因北京感到來自美國之威脅而加烈，並使反帝成為「反美帝」運動而升級，到了六〇年代與蘇聯交惡後，才又發展出反蘇修、反社帝的排外。這一時期的排外的特性是一方面它成了加緊內部控制的藉口，另一方面，它又成為權力鬭爭中的重要政治工具（頁 149）。作者指出，中國羣眾排外示威是由黨及政府動員組織的。排外的敵意來自黨政領導層更多於羣眾的自發（頁 175）。一九六三年中共與蘇聯反目後，毛派通過宣傳機器，把對蘇修的譴責用來加強對劉（少奇）鄧（小平）「走資派」的攻擊，排外成為政治上摧毀內部敵人的有力武器（頁 238）。排外在中共手裏事實上已變為達致多目標的手段。排外中之「反美帝」與其對第三世界的「統一戰線」的建立即緊不可分；排外亦甚至可以用來為促進生產之動員。作者在「排外示威與生產動員」的「一項實證調查」（頁 170）中發現，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當工業動員程度處於高水平時，羣眾排外示威也相應升級，亦即排外示威隨著生產動員而升級，廖博士認為自中共完全控制了全國政治機器之後，有時便以「應用對外敵意來解決內部問題」。他更指出，在統治危機時期，中共領導便轉而求助於排外，利用排外來爭取國內的支持。排外成為動員羣眾的有力工具（頁 292）。

卷四「現代化與排外」。這是指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七年這段時期中共在排外上的降級與退潮。自一九七〇年中共加入聯合國；一九七二年中共與美國簽訂上海聯合公報之後，中共在排外示威上急劇減少。一九七〇年有二百六十多次，到一九七一年降為二十七次，一九七五年周恩來提出以經濟發展實現現代化之後，北京的「反帝」

的聲音更爲減弱，至一九七七年，羣眾集體排外幾乎絕跡。作者認爲中共排外之退潮，固然與美國北京交好之事實有關，而中共現代化政策也是導致排外思想低落的重要因素（頁 265）。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行開放政策，發展「四個現代化」，更一改以往之孤立政策，積極吸取西方科技、外資。以是，「以往由黨公開領導的排外運動，在開放政策之下已不合時宜了。」不過，作者認爲「在內政困境之際」，尤其「當內部緊張，而領導階層意見不一致時」（頁286），還是可能再出現排外事件的。廖博士相信，「只有將統治危機和排外控制在低水平上，中國的現代化才可能達到預想的目標。」（頁295）。

上面簡單的陳述，當然不能充分展示廖光生博士「排外與中國政治」大著的豐富的內涵。值得再次提出的是，他的分析以排外這個概念徹上徹下貫穿過去一百二十年中國的政治，確是做了前人所未做的工作。他所提出的一些假設、論斷都是極富啟發性的。毫無疑問，廖博士書中的某些觀點與論證之方法及結果不必一定都能爲歷史學者與社會科學者所同意，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作者在這方面是作了很有意義的開荒性的研究，他爲我們對中國近代政治的理解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這都是我所欣賞與欽佩的。

金耀基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

中文版序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廖光生博士，積多年的研究，完成了這本體大思精的專著《排外與中國政治》。本書先出英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八四年初版，報刊書評反應甚佳，一九八六年再版；作者用中文加以重寫增訂，現在即將出中文版，由香港明報機構印行。英文版的「前言」是艾倫·S·惠亭教授（Dr. Allen S. Whiting）寫的。二十多年前他在美國的當代中國問題專家之中名列前茅；後來惠亭博士被政府網羅，成為國務院的中國問題首席專家；文革期間曾以「美國總領事館副總領事」身份在香港駐紮兩三年，對大陸變局進行近距離觀察。後來他擔任密西根大學教授，廖光生正是他的得意門生。廖光生博士是在文革時期首次訪問香港，在大學服務中心致力他自己的研究工作。那時期筆者擔任友聯研究所所長，常有機會與他交換意見。一九七四年他重臨香江，在中文大學任教；十餘年來筆者也常有機會向他請教。惠亭博士在英文版前言中，對本書有清楚的評介，推崇備至。其實如把他那篇前言譯出作為中文版的前言，就很適當；但作者卻決定換一篇前言，並且把這任務交給筆者。受寵若驚之餘，筆者只得遵命。

本書英文版書名是（*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860-1980*），即是《中國的排外與現代化（一八六〇至一九八〇）》；中文版書名改為《排外與中國政治》。這樣一改，雖然

簡潔一些，但對主題的時期性就不如英文版書名清楚。事實上中文版所涵蓋的時期，應該算是「一八六〇至一九八七」，也就是從「英法聯軍入北京」的最大震盪，直到今年「胡耀邦辭職事件」的最新震盪。這一百二十多年，是中國「現代化」的坎坷歷程；而正如作者在「導言」第一段所說：「一部中國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國主義侵華史，又是一部中國人的禦外史。任何關於中國政治或對外政策的研究，都離不開對中國的排外情緒的探討。」

當然，任何國家都有——或至少都會有——排外情緒；而中國的排外情緒也不是到近代才開始有的。《左傳》有一句名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充分顯示對「外族、外國」的不信任心理。韓愈《原道》有幾句話：「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這更充分顯示對夷狄的排斥心理。可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基礎的漢族，在民族性上是相當寬厚的；而作為漢族文化的主流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在氣質上也是相當和平容忍的。一般來說，中國的當政者和老百姓沒有興趣侵略外國，也並不排斥以和平方式前來的外國人和外國事物。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大為昌盛；雖然有韓愈那種衛道之士痛心疾首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朝野人士大部分仍然並未加以排斥。

從周朝到清朝中葉，亞洲大陸上各個外族對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曾有多次衝擊；但他們的威脅大體上還是中國所能應付得了的。雖然漢朝的匈奴成為相當嚴重的邊患，晉代的五胡之亂更搞得中國一塌糊塗，卻並沒有動搖中國的國本。宋代有遼金的侵略，使漢族的王朝大受威脅；隨後蒙古人席捲大陸，宋朝終於亡了國，首次由外族統

治中國。漢族的政治統治，經過明朝的復興時期，到滿清入關時再度亡國；雖然清朝是異族統治中國，本質上仍是中國。然而，到清朝中葉，從海上來了碧眼藍睛、船堅砲利的歐洲人，形成了中國前所未見的新的「外患」，而「排外」問題在本質上也與以前完全不同了。

遼、金、蒙古、滿清等族，雖然也曾以「異族、外國」的姿態威脅中國，但他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遠遜於中原地區；他們的人種基本上與漢族同屬黃種人，即是人類學上所謂蒙古人種；而他們的政治野心是「入主中原」，即是把他們原有的國家併入中國，把首都遷到中國的大城，由他們的首領做中國皇帝。所以他們相當容易地、並且相當願意地在「中國」這個民族洪爐中被同化，「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是從歐洲來的新「夷狄」則基本上是另一回事。他們的精神文明與中國相比，孰優孰劣，可能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但中國人至少得承認他們也有悠久傳統，而且有較旺盛的活力。至於他們的物質文明，則顯然比中國發達，洋鎗洋砲就是最有力的證據。他們的人種是與中國各民族有顯著差異的白種人，即是人類學上所謂高加索人種。而他們的政治野心是把中國變成像印度那樣的一個殖民地；他們並不打算把他們原有的國家併入中國，或把首都遷來中國，而「中國皇帝」的頭銜只不過被當作可以鑲到他們首領的皇冠上的一顆珍珠。

中國朝野人士如何對付「西洋鬼子」以及後來積極參加侵華的「東洋鬼子」，構成清朝中葉以來「中國近代史」的一條主脈，也構成廖光生博士這本書的主題。他基本上是採取史學家的筆法，夾敘夾議，檢討中國過去一百二十多年的排外努力、現代化進程以及內政外交的相互作用；但他也採取政治學家的眼光，用現代政治學的觀念來分析事態的發展。他所選擇的這個主題，既重要、也複雜；而且，它涉及許多微妙的、顯似矛盾的綜合情緒，不能用囫圇吞棗方式處理。

例如，「排外情緒」與「懼外情緒、媚外情緒」的相生相剋；「排外」立場與「西化」主張的交互推移；五十年代中共政權一方面對美國強烈排拒，一方面向蘇聯無條件「一邊倒」。

全書討論的範圍包括晚清、民國和中共政權這三大時期，籠統說來是十九世紀後半葉、二十世紀前半葉和二十世紀後半葉；但內容偏重中共政權成立後的三十多年。除了導言和結論兩部分之外，全書十三章；其中第一章是對「排外的概念及理論」的比較抽象的研討，其他十二章之中只有四章討論晚清和民國時期，卻有八章討論中共政權各階段各方面的排外情緒及政策。這種重點配置自是很有道理的。

中國這一百多年的排外情緒，是很複雜的課題，但作者把它理出清楚的頭緒。例如他指出：排外並不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固有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是由外來侵略所激發的民族主義的反應表現；但一九四九年以後則排外成為當時中共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部分，用來動員羣眾、爭取支持；而到政權比較穩定、需要認真從事現代化工作時，當政者就不再操縱鼓動排外情緒。但他警告說：「現代化無論在何時何地發展，都會引起社會變遷、挫敗和政治參與的要求；中國亦難例外。而這些後果難免又引起新的排外、新的統治危機。」而他全書的最後一句話是：「因此，除非建立一種可以控制統治危機和排外的政治制度，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可能再遭受到嚴重的阻礙。」這不是一個泛泛的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而是從深刻研究中得到的一個客觀結論。

對本書的主題，筆者個人的了解遠不及廖光生博士之精深；在這裏只不過以一個讀者的地位，向其他讀者略作評介而已。

徐東濱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於香港

自序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拙作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後不久，即告售罄。一九八六年再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第二版。一九八七年六月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中文版，至今已印二版。日本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亦計劃今年把它譯成日文出版。

作者研究中國政治多年，總覺得中國人對外國的認識頗欠客觀。中國許多領導人常把一百多年來的積弱歸咎於帝國主義，而忽略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之正面作用。帝國主義的侵略固然是令中國人排外的主因，但許多排外事件皆與內政有關。領導人常故意刺激排外情緒以減低內政壓力。排外雖可以在短期內收安內之功效，但鎖國政策造成盲目自大，閉門造車，禍害無窮。作者謹希望本書的一些意見可以幫助國人正視世界，矯正偏見，意識到中國要長期穩定地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不可不摒棄排外、拒外或媚外的心態。

本書除了改寫與翻譯英文版以外，並做了若干補充。增寫第十二章〈開放政策與排外〉及後記。本書得以順利出版應歸功於一些朋友與同事的鼓勵與支持，特別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詹德隆先生及明報副總編輯麥中成先生的支持。本書翻譯、出版亦曾得多方協助，其中以方良柱先生、徐澤榮先生、熊景明女士與黃燕霞小姐幫助最大；更

難得徐東濱先生與金耀基教授在百忙之中撥空撰寫序言，使本書增加不少光彩。幾年來，承蒙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與聯合書院學生工讀計劃資助研究，在此一併致謝。最後感謝內人廖紀寬雅二十幾年來之支持與鼓勵。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

香港中文大學

排外與中國政治 目次

金 序

中文版序

自 序

導 言 1

第一章 排外的概念及理論 7

一、排外的概念 9

二、排外的性質 12

三、排外與反帝的關係 13

四、國內政治與排外 15

五、排外的一般理論 16

六、探討的主要問題 21

卷一 早期現代化之失敗及排外之興起

第二章 尋求抵禦外侮的方法 27

一、早期抵禦洋人戰略的探討 28

二、對付內亂和外患·····	33
三、太平天國事件和列強·····	34
四、中國早期的現代化：自強運動·····	35
五、自強運動的失敗·····	42
小結·····	44
第三章 反傳教運動和排外·····	45
一、基督教與儒家·····	46
二、士紳與反教活動·····	48
三、反傳教運動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53
四、排外的擴大：中日甲午戰爭後的反教情緒·····	54
五、義和團事件和以民制「夷」（一九〇〇年）·····	57
小結·····	59

卷二 為國家的獨立平等而反帝

第四章 二十世紀初期的排外和民族主義·····	63
一、早期民族主義和「拒俄運動」（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五年）·····	64
二、聯合抵制美貨運動（一九〇五年）·····	67
三、收回權益運動·····	69
四、外國在華投資·····	73
五、排外的抵制行動（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六年）·····	83
小結·····	90
第五章 國民黨的反帝與抗日·····	93
一、關稅限制和不平等條約·····	93